

彰显战略智慧与人类情怀的壮丽史诗

——全国知名专家共话中共中央南方局和重庆谈判

中共中央南方局取得哪些伟大胜利？作出了哪些历史贡献？对当代有何启示？重庆谈判为巩固抗战胜利果实、争取和平、避免内战，作出了哪些历史贡献？

8月26日，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委党史研究室、渝中区委、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西南大学联合承办，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西南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执行的“宣传出去 争取过来——中共中央南方局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学术研讨会暨“中共中央南方局与世界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中共中央南方局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毛泽东与重庆谈判’两大议题，进行了分享。

补陈云、彭真为书记处候补书记，领导核心仍在延安，延安不要轻易搬家。

东北先派干部，后派军队。这是决定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一招。

在重庆，毛泽东多次强调，只有民主才能给全国人民以幸福。

成立九三学社。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宣告成立，成为中国的一个正式民主党派。

首次公开展示气魄与抱负。亲笔手书《沁园春·雪》赠给柳亚子，后公开发表，以诗言志。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谈判期间，毛泽东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人士多次断言、反复强调这句话。这个论断绝不仅仅局限于重庆谈判，而是道出了一个永恒的真理。

杨明伟： 开创对外工作崭新时期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周恩来等人开创性的工作思路下，以扩大国际统一战线作为外事工作的重要使命，以‘宣传出去，争取过来’作为外事工作的总方针，广泛开展国际交往，打破了国民党的外交垄断，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一个崭新时期。”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原局长杨明伟称。

在他看来，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对外工作：开创了党对外事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工作体制。在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下，无论在组织上、指导思想还是方针政策上，与党中央高度一致，完全体现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原则，完全能够代表党中央的声音。

创立了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统一的外交哲学。充分体现了高度的原则性与高度的灵活性的辩证统一。在原则问题上，从来都是寸步不让、寸土不让；在灵活性问题上，又极其灵活机动，不拘一格。

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工作的人才基础和人才基础。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建立了广泛的国内国际人脉基础，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工作的人才基础。

宋月红： 为中国提供重要政治基础

“中共中央南方局开展民族民主革命斗争，成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力量源泉，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提供了重要政治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宋月红称。

在他看来，中共中央南方局针对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以斗争维护统一战线，并重视争取代表地方实力派和民族工商界的中间势力；在摩擦与反摩擦中，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等，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斗争维护了全民族团结抗战。

中共中央南方局还贯彻党的“联合政府”主张，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一党专政”，发展民主政治运动，力争建立“联合政府”，推动民主政治发展。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其重庆工委从和平、民主、团结的要求出发，面对内战的严峻危险，积极配合党中央进行国共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的召开；反对内战独裁，反对美国“扶蒋反共”；放手发动群众，进一步发展统一战线工作，推进了民主政治运动发展。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抗战时期的革命斗争，深刻体现了为全民族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主动，彰显了决定中国光明前途的历史主动。”宋月红说。

武力： 见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重庆谈判的历史，验证了在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会会长武力表示。

在他看来，重庆谈判的历史经验，首先在于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抓住了开展和平斗争的机会。其次，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中共中央作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等。再次，在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完美结合，不仅保住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胜利果实，还在政治上、舆论上获得了主动、赢得了民心。最后，在谈判的底气——战场上，寸土必争、决不退让，为谈判增添了筹码。

“重庆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前途‘针锋相对’，绝不妥协；为和平民主而争取国内外最广泛理解和支持，可以有所让步。这一立场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赢得解放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他说。

侯中军： 为世界树立了东方样板

“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都先行一步，走在引领之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过程，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侯中军表示。

他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最早对日宣战，呼吁建立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东方战线。而在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把建立国际的抗日统一战线视为一个必然选项，将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视为一个整体，而且以其抗日反帝的彻底性引领了统一战线的建立。

1941年10月，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为世界人民团结抵抗法西斯树立了东方样板。

“在走向世界人民团结抵抗法西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了东方民族的反法西斯同盟，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完成了东方部分。”他说。

江英： 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是中国现代史上争取和平民主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称。

在他看来，重庆谈判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是一个重要节点。重庆谈判签订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同意和平建国、避免内战、推动政治协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

后来，国民党撕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解放战争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开启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重庆谈判，塑造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提升了中国作为反法西斯同盟重要成员的政治信誉。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展示了和平诚意、展示了共产党光明磊落和英勇无畏的品格。而他在重庆发表的《沁园春·雪》，更是在国内外产生了轰动效应，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说。

张皓： 提出、发展和发动民族革命战争

“中国共产党提出、发展和发动了民族革命战争。”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皓称。

他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提出、发展和发动，是中国共产党从土地革命走向民族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中，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5年12月，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提出和发展阶段；1935年12月至1937年2月，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准备阶段；1937年2月起，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发动阶段。

“从1935年华北危机开始，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口号是‘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推动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各军队发动大规模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民族革命战争发动起来之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取得最后的胜利。”他说。

吴兵： 奠定了中国外交事业的基础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战时大变局背景下创造性开展外事工作，积累了宝贵历史经验，培养了优秀人才，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事业的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思想的重要来源。”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吴兵称。

在他看来，中共中央南方局统筹国内国际统一战线两个大局，与各国驻华机构人员交往，打破国民党当局的外交垄断，促成了中外记者团和

美军观察组赴延安，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了解和他支持，特别是董必武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首次登上国际舞台。

“深入研究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工作历史，总结南方局外事工作的历史经验，服务于当前百年变局下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他说。

周勇： 探究历史的文化意义

“重庆谈判已过去80年，足够让我们从更加长久、更加宏阔的视野，来重新审视这个事件。既往的研究，多着眼于事件本身，而今天应该着眼于未来，需要以历史学为基础，拓展文化视野，努力形成多学科、多视野、共同研究、深化研究的新局面。”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西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周勇称。

在他看来，“历史的文化意义”，就是用大历史观、大党史观、大文化观去研究某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即在传统历史学视野和理论方法还原历史事件的基础上，从文化的视角去解读历史事件的起因、发展、结果、地位、作用、意义，为当今的中国和世界贡献历史和文化的智慧，实现历史学“资政”与“育人”的功能。

他认为，从政治文化的视角观察，重庆谈判留下的重要历史经验包括：在处理中国前途命运的问题上，所有的党派都应该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以党派的私利为重；中国的一切政党要善于正确分析形势，牢牢把握“和平、民主、团结”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在处理两党关系问题上，要善于求同存异，让步而不放弃原则；在处理同广大的中间党派的关系上，要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派合作是历史和现实的选择，“和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

潘洵： 彰显战略智慧的壮丽史诗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国际统战工作，是一部彰显战略智慧与人类情怀的壮丽史诗。历史雄辩地证明：团结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合作是应对挑战的必由之路。今天，我们需汲取这份历史智慧，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西南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教授潘洵称。

在他看来，从历史逻辑看，中共中央南方局国际统战工作实现了理念、空间与组织的三维创新；从实践路径看，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四大策略创新，开创了国际统战工作新局面；从历史贡献看，中共中央南方局重塑了反法西斯东方战场新格局新形象。

“这启示我们，面对全球性挑战，人类共同利益超越制度差异，这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我们要秉持开放包容理念，寻求最大公约数；重视民间交流与人文纽带，夯实民意基础；立足自身奋斗，以实力赢得尊重与支持。”他说。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韩毅撰写）

▼7月15日，渝中区红岩村景区，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大楼旧址。（资料图片）
记者 尹诗语 摄/视觉重庆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重庆市分行 织密金融安全“防护网” 守护山城百姓“钱袋子”

今年以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重庆市分行在重庆市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的指导下，持续完善金融知识教育宣传工作长效机制，组织开展了2025年“岁末年初防范非法金融”宣传活动、2025年“3·15”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活动、“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等一系列防非打非宣传活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金融素养与风险防范能力，为构建安全、和谐的金融环境贡献了积极力量。

特别是6月以来，该行牢牢把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主题，充分发挥线上线下渠道优势，聚焦重点人群和风险多发领域，全面开展2025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活动，切实提升了公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有效遏制非法金融活动蔓延，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成效。

强化统筹部署 层层压实主体责任
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农发行重



庆市分行高度重视防非打非工作，并始终将其当作一项关系民生和金融稳定的关键任务。

今年6月是全国“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农发行重庆市分行将《防范和处

置非法集资金额》宣传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金融知识普及有机结合，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层层压紧压实主体责任，认真组织并督导辖内36个分支机构积极做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教育工作，形成了上下联动、协同配

合的工作格局。

为扎实做好此次宣传月活动，农发行重庆市分行结合实际，制定下发活动通知，将本次宣传活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宣传“加强金融防范，暖心金融服务”、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虚拟货币炒作风险防范和处置等宣传内容有机结合，增大宣传力度。此外，辖内各分支机构认真筹划宣传活动，制作横幅标语、印制宣传手册、培训宣传人员等，采取阵地与移动宣传、线上和线下宣传相结合的方式，为活动顺利开展做了充分准备。

开展多维宣传 深入基层突出实效

营业网点是面向客户的第一阵地，也是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教育的前沿阵地。走进农发行重庆市分行各分支机构营业网点，浓厚的宣传氛围扑面而来：LED、电视屏等滚动播放宣传标

语，宣传展台整齐摆放着宣传手册，柜面专员随时为客户答疑解惑……同时，该行积极将防非宣传融入业务办理流程，将网点打造成常态化宣教窗口。

在本次宣传活动中，农发行重庆市分行积极探索金融知识普及工作新载体、新渠道、新模式，推动金融知识普及向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发展。如：创新制作防非宣传短视频，通过传播更快、更广的线上平台，向社会公众广泛宣传金融知识；利用微信群、微信朋友圈等线上渠道积极转发金融知识宣传片，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贴近实际的金融知识通过线上渠道送到群众手上；依托行内短信金融服务平台等渠道，向企业客户发送电信诈骗案例短信等。

值得一提的是，为持续深化防范非法金融宣传月活动，农发行重庆市分行各分支机构积极配合当地监管局、人民银行、银行业协会等部门，参

加了当地组织的集中宣传活动。同时，聚焦青少年、老年人、农民、务工人员等重点人群，根据其金融知识水平、知识需求和行为特点，组织开展防范非法金融宣传“五进入”专项活动，走进乡村、学校、企业、社区和养老服务机构，把课堂搬到群众身边，将金融知识送进千家万户。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是一场持久战。下一步，农发行重庆市分行将继续坚守政策底线，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继续完善防非宣传长效机制，持续做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工作，为维护区域金融安全稳定保驾护航。

文/图 农发行重庆市分行

